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三四期 ——
(二〇〇八年三月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03c)

【史海钩沉】	吴宓痛斥“文化大革命”	何 蜀
【解密档案】	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的两个文件	刘振武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吴宓痛斥“文化大革命”

• 何 蜀 •

著名学者吴宓，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与其他众多学者一样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且还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的所谓“现行”，就是他公开或私下明确而尖锐地发表的反对“文化大革命”、斥责毛泽东的若干言论。在《吴宓日记续编》（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一版）中，这类言论随处可见，字里行间无不闪耀着吴宓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光辉。

◇ 憎恶“大批判”

“文化大革命”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序幕。在《吴宓日记续编》中，有关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性”言论，最早见于1965年12月23日。此前，作为四川省政协委员的吴宓到成都参加了四川省政协会议，12月10日回到在重庆市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但此日之后至20日前的部分日记在“文革”中被抄走后失去。因此现有记载中已经是在“续讨论”吴晗遭到批判的剧本《海瑞罢官》了。此前的日记中是否另有相关文字，现已无法得知。

吴宓在1965年12月23日日记中记载：“下午……在古典文学教研室续讨论吴晗19

61所作京剧剧本《海瑞罢官》……在讨论时，宓闻诸君之发言，愤怒不服，几欲发作，然能始终隐忍含默，未露形迹，幸耳。”（第七册313—314页）

从这则日记可知，从这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吴宓就是“愤怒不服”的态度。

1966年1月13日晚间，吴宓应邀至普施泽教授家参加民盟的组织生活（吴宓非民盟盟员，系来宾）：他在日记中记载：“座谈《〈海瑞罢官〉应如何理解？》，宓等四人先各抒己见。宓谓：宓一意恭恪服从，但恒苦不知党政每一运动中之真实意旨所在，然自1964春以来，加强阶级斗争，阶级观点，批判吴晗，评斥《海瑞罢官》，只是教我们如何认识历史、文学，即是‘封建社会，地主官僚阶级，从来无一好人，无一好事’，勸我们如是想，如是说而已，云云……”（第七册338页）

姚文元已经把吴晗《海瑞罢官》中写的“退田”、“平冤狱”都说成是影射、攻击现实了，吴宓却毫不顾忌地在1966年1月15日日记中写下他影射、攻击现实的感慨：“晚，久读《石头记》抄家前后若干回，与解放土改等比较，伤心落泪不止。”（第七册343页）

1966年2月12日古典文学教研组会议上，讨论到“批判继承”时，吴宓在日记中记下他的发言要点：“宓谓，此中有极大困难，宓不敢言。”接着以小字注：“盖谓，今日并不许人用其理智，作真批判。”（第七册370页）

真是一针见血。吴宓在这里所说的“真批判”，指的是真正的学术批判，而不是毛泽东、姚文元那种所谓的“革命大批判”。

1966年2月19日：“10—12古典文学教研组讨论《谢瑶环》（田汉1961依据陕西碗碗腔《女巡按》再改编的京剧本，凡十三场），宓最后始作简短之发言，表示宓接受云松文及诸同志发言之见解及主张；但暴露宓极喜悦《谢瑶环》剧中之爱情故事，不嫌其荡（关君斥为淫荡），只觉其美；且此剧文字之工，词藻之美，亦远在《海瑞罢官》以上也。”（第七册377页）

“云松文”指《人民日报》2月1日发表的云松《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吴宓一方面表示“接受云松文及诸同志发言之见解及主张”，另一方面却又公开赞赏已经被批判为“大毒草”的《谢瑶环》的内容（爱情故事）和艺术（文字、词藻）的“美”。其天真、无畏之态跃然纸上。

1966年3月23日：“10—12至文科图书馆读邓之诚编撰《清诗纪事》八卷二册，惜止于康熙中年。然亦可见当时政治受祸之酷，与文字科罪之严。其过程则先松后紧，与近今同。”（第七册399页）

这个“与近今同”的评价，把“文化大革命”比之于清代“政治受祸之酷”、“文字科罪之严”的文字狱，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不少文化人还在诚恐诚惶为之欢呼之时，能有这样的洞见，是极具胆识的。

1966年4月14日：“阅《重庆日报》对吴晗批判汇编。实则晗之所论皆宓之所欲言，特宓不涉政治，既无讽刺指责之私愤，亦乏谏辩箴规之愚忠耳。”（第七册414页）

1966年5月12日：“8—6古典及现代文学教研组批判邓拓座谈会，宓首发言，其中赞美中国之王道，又谓古帝王亦有爱民而行善政者，皆不合今之说法。”（第七册432页）

已经到了举国上下都在大批吴晗，大批“三家村”的时候，吴宓还敢作这样的发言，岂有不当“反革命”之理？

◇ 不堪“革命”盼速死

在“文化大革命”中，吴宓不堪忍受这样的“革命”对精神上的折磨，多次在日记中写下“实愿速死”、“盼早日死去”、“惟祈速死”的文字。

1966年3月4日，吴宓补记了他当天下午在古典与现代文学教研组学习“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讨论中的发言要点：“宓发言，谓不能亦不敢与焦比较（∴非同路人）。宓今有‘生与死’之矛盾，即是‘生不如死’——盖宓之阶级生身、教育、工作、成绩 etc.（指旧时代），皆使宓成为党与人民之‘罪人’，而反蒙党与学校优待，同志们之礼遇，殊深感愧。今宓实已完全不能工作（所有宓之学问、能力、特长、创造 etc.，在今不惟无用，而且有害），反不如赖老之早日长眠地下……”

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他所说到的“赖老”，是西师中文系教授赖肃（以庄），在此前的2月17日病逝，终年76岁。

1966年3月15日：“下午……续讨论近日师生《海瑞罢官》学习之佳作九篇其五、其六，记录粘存。中间几乎不能自持，十分气愤。此长期学习为大苦，实愿速死为佳……”（第七册394页）

1966年3月30日：“下午……中文系教职员教学改革学习会，记录粘存。按，近年厉行阶级斗争，督促思想改造，既举中国数千年之德教习俗、学术文化，摧残渐灭净尽，已使吾侪伤痛已极，而在各种讲演报告学习、讨论会中，更视宓等老教授为阶级仇敌，反动、落后、顽固分子，冷嘲热骂，使耳聆、目击、身受者，更不能堪。宓今日下午学习会中，又起此感，惟盼早日死去，如赖老之长眠地下，真成无知，是诚幸福也已！”（第七册403—404页）

1967年2月8日（“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个除夕），当晚，孤独的吴宓在日记中悲愤地写下：“宓在世已七十四岁，计生平过年未有如今年之悲凄者。倘于1966春死去（病歿）宁非宓之大幸；今惟祈速死而已。”（同上书第八册38页）

◇ 痛恨“破四旧”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大力提倡、鼓动下，“破四旧”之风从1966年8月中旬开始兴起于京城，随即刮遍全国。8月23日，吴宓记载了下午的全校大会上学生代表要求将学院办公楼、图书馆等另改革命名字，院文革筹备委员会主任、院长徐方庭讲北京商店街道的改名情况等，他悲伤地写道：“知此次由毛主席之提倡，红卫兵之活动，北京以及各地之更改孔多，不但千年中国文化，而全国社会秩序亦骚乱不堪矣。”（第七册529—530页）

8月31日，西师的官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开始抄家，据吴宓在他那几个月日记被红卫兵搜走后所写的备忘录中记载：“九月二日上午红卫兵（中文系）来宓舍搜查：共来四次，取去《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全套，《吴宓诗集》26部，吴宓日记1910至1966八月二十三日，吴宓诗文稿笔记，以及其他书物（生活资料、旅游画片、毕业证书、有关恋爱书刊、西洋名画等）。”（第七册532页）

吴宓在1967年除夕的日记中补记了他给造反派组织“交待”的1966年9月2日被官办红卫兵“破四旧”抄家后的感想：“经过此次‘交出’之后，宓的感觉是：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灵魂，都已消灭了；现在只留着一具破机器一样的身体在世上，忍受着寒冷与劳苦，接受着谴责与惩罚，过一日是一日，白吃人民的饭食，真是有愧而无益也！”（第八册38页）

1967年5月9日，吴宓在教师“牛鬼蛇神劳改队”劳动中，再次看到了自己被抄去的心爱的书物，他在当天日记中痛心地写道：“1966八九月之交，红卫兵抄去郑思虞、徐永年及宓等之书稿文物，均锁置于3121室中。今因需用该室，遂于10—11时，呼劳改队诸君往，将室中所存悉搬来教师阅览室，堆置书橱间及地上，宓之日记及《吴宓诗集》、《学衡》杂志等全在焉。旋命诸君往扫除该室竟。最后二红卫兵（学生）来，贴封条（‘1967五月九日八三一中文系大队封’）书橱巷门及宓之书物上。——宓目睹心爱之书物不得取回，不胜伤心愤恨……”（同上书第八册124页）

怀着这种“伤心愤恨”的心情，吴宓趁造反派组织忙于打内战，管理松懈之机，多次将自己被抄收的书物择要“偷”回（详见笔者所撰《吴宓“偷书”》，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六期）。以实际行动对所谓的“破四旧”进行了坚决的反抗。

◇ 鄙夷“教民作伪”的政治表态

1966年4月6日上午，西师中文系召开学习解放军“三八作风”的讨论会，吴宓在当天日记中记载：“宓发言一次，自己检查，虽言之甚诚，犹不合格。盖按照‘阶级观点’，则凡我辈地主及资产阶级出身之人，决不能有任何善言善行，且必不能改造。而数千年之中国，古与今之西洋，除马恩列斯及工人、农民外，亦无一好人，无一好事，无一长之可取，无一德之足记。……故学习会中之发言者，率皆依据公式、定规，而巧佞其辞，自贬自责，言不由衷。即座中听其言者，亦共知其非诚，然必如此乃可生存栖息于今之学校、社会。呜呼，是教民相率趋于作伪而已。其不合情理，强人以所难，更不待说也。”（第七册408页）

吴宓入木三分的批评，揭露了这类“教民作伪”的政治学习的虚伪丑陋及祸害，即使今天读来，也会感到有振聋发聩之力。

在最初的批判高潮中，西师中文系教师杨欣发遭到批判，系主任布置教师人人都得写大字报，吴宓写的大字报先是只表态“划清界限”而无内容，后是只写了一件小事而无高度，都不合格，他在1966年6月14日日记中写道：“盖今者必强以一切事归于阶级，功罪皆然。故众必欲宓承认‘宓之斗争杨欣安不力，纯由宓出身地主阶级（而非因宓今已七十三岁，年老力衰），’……若云‘实由宓曾读孔孟之书，夙行仁恕之道’，则必为诸君所更不容许者矣，故宓心滋痛伤。”（第七册456页）

1966年7月24日，他讥讽当时一般人已经习以为常的“作伪”表态：“晚……中文系师生员工‘拥护刘少奇主席庄严声明及支持胡志明主席战斗文告大会’……诸人演说，虽旨在援越抗美，而皆力言‘必须尽情揭发，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且若以文化大革命办成即可保证抗美援朝之胜利者，诚宓所不能解也。”（第七册494—495页）

吴宓拒绝参与这样的“作伪”表态，遭到了市委工作组批评。7月29日：“工作组乙同志作总结：诸君应以多写大字报，将中文系揭发深透，完成文化大革命，实行表示热爱党与毛主席——有一部分同志，所写大字报甚少（按，宓首为其一），今后望多写云云。”（第七册500页）次日（7月30日），他在日记中即记载了他的消极对抗：“10—12命写大字报。宓自整编文件及报纸。”“夕5：30—6：30众写大字报，宓假寐，坐息。”（501页）

◇ 哭“黑帮”

8月1日，中共重庆市委驻西南师范学院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宣布：“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两个月来，西南师范学院已经揭发出以副院长王逐萍、方敬为首的“黑帮”，号召全校革命师生继续深入揭批。吴宓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今知运动转入批判斗争阶段，宓不胜忧惧。众对王逐萍及方敬皆‘墙倒众人推’，纷纷从井下石。其实西师领导人中，能知晓教育、学校及学术、课程、业务为何事者，仅一方敬而已。宓以方敬为西师惟一功臣，亦宓之知己，今见其覆亡，不敢效蔡邕之哭董卓矣。”（同上书第七册502页）

方敬是现代诗人、散文作家、教育家，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三八”式干部，在西师分管教学业务，对吴宓十分尊重。因而吴宓对他的被打成“黑帮”深感不平。8月2日，吴宓在工会组织生活会上的发言被斥责为“美化方敬”、“为方敬辩护”，他又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哀哉！蔡邕哭董卓之死，为王允所杀，宓之谓乎？”（第七册504页）

吴宓两次使用了“蔡邕哭董卓”的典故来表明自己对“黑帮”方敬被打倒的痛心。蔡邕是东汉末年文学家、书法家，在董卓专权时，被迫为官，官至左中郎将（故称蔡中郎）。董卓虽专横，但却很看重蔡邕的才学，对他“甚见敬重”，“厚相遇待”，董卓被诛后，蔡邕在主持诛杀董卓的司徒王允面前“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被王允斥责他“怀其私遇，以忘大节”，并认为“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竟将其下狱，后死于狱中（见《后汉书·蔡邕传》）。

8月7日，吴宓读了报上批判周扬、罗列周扬种种“反革命罪行”的文章后，不但没有如批判者所期望的那样对周扬产生愤恨之情，反而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独特的感慨：“阅报，益觉周扬尚有关心文艺、为民请命之意；此后，除歌颂毛泽东思想而外，无丝毫学术文化之存余矣。”（《吴宓日记续编》第七册512页）

◇ 痛心文化之亡

1966年8月23日，吴宓在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遭众批判斥责”，他当晚在日记中写道：“……自毛主席会见北京文化革命代表后，全国骚然，宓既心痛数千年中国文化之亡，又忧宓本人在运动中能否过关之事，于是近两日宓心神恍惚，已不能神志清明地控制指导自己之言动……”

针对工作组奉命撤走后指派学生组建文革筹委会主持校务的现状，他悲叹：“且自学生主政，运动之期限延长，须至1967年春夏方可望结束，是则宓决难望活至运动结束之时矣。”

在“运动之期限延长”这一点上，吴宓低估了这场浩劫的肆虐时间，他怎么也想不到竟会长达十年之久。

1968年2月27日：“宓每日阅《新重庆报》，恒感今日中国之报纸，其中所载，无新闻，无纪事，只有宣传与教训（毛泽东思想）而已。学校中所谈所写所读者，亦惟是此种毛泽东思想之宣传与教训；至于中西古今之学术文化，已无人眷念及称道及之者矣。”（第八册391页）

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吴宓在1967年11月28日说的一句话。他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上午……众论运动之莫知如何‘到底’及十年后运动再来‘应是如何情形耶？’——宓插言

曰：‘届时已无文化存留，可资改革矣！’（言出，又甚悔之）。”（第八册303页）

毛泽东一再说“文化大革命”要过七八年就再来一次，当时许多人都曾设想、议论过下一次“文革”中自己应该如何吸取这次的教训，如何更少失误，更多胜算。然而，当诸位“牛鬼蛇神”教师在议论猜测十年后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应是如何情形时，吴宓却在一旁一针见血地插话说：“届时已无文化存留，可资改革矣！”

文化存留都已经没有了，还谈什么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在当时全国上下的痴迷、疯狂中，吴宓独自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可悲可怕的前景。他这一插言，现在读来也令人感到有石破天惊之震撼。

◇ 质疑为何搞“文革”

1966年12月15日：“上午7：50—11：30菜圃工具室学习……宓首发言，提出二疑问（为宓所不能解者）乞众指教：（i）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何故必须有此运动？（ii）此运动何故必须采取群众运动之方式？（宓言颇长，耿、彭二君为归纳成此简题）……”（第七册555页）

这样的问题显然没有人能够回答。但吴宓却耿耿于怀。一年多之后，他再次重提这个问题。1968年3月4日，教师“牛鬼蛇神”小组上午学习结束后，其他人都走了，吴宓走在后面，问“组长”成文辉：“宓读《毛选》四卷，深敬佩毛主席，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则疑（不解）毛主席何以不明降惩罚于刘、邓及其党羽，而必作出此广大、曲折、繁复之文化大革命运动乎？祈有以教我。”

“成君答曰：与公同具此感之人甚多。今欲解决此疑难，只有注意一事：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方能知悉党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之斗争是如何剧烈而久长，而毛主席独力卓识，坚强奋斗，经此运动，方得在党内、国内取得全胜，进而可以在全世界取得全胜；苟无此运动，则中国人民大众及全世界人民大众莫能获得解放与幸福——公如此去想，则庶能拥护此运动而益敬佩毛主席矣。宓唯唯，而先出，回舍。”（第八册396页）

“成君”即成文辉，原为西师工农速成中学教员，“摘帽右派分子”，贬为中文系资料室资料员，是他们这个教师“牛鬼蛇神”学习小组中最年轻的一个，被造反派指定为组长。成文辉的家庭经济困难，常得到吴宓的济助，因此对吴宓比较照顾。

显然，成君的回答只是一些大而化之的空话、套话，是不能使吴宓满意的。而且，成君并未体会到吴宓提问中已经含有对毛泽东深深的谴责之意。

◇ 痛心学生受毒害

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由毛泽东下令广播发表后，全国各地高校的学生纷纷仿效，一时间大字报贴满校园，20日晚，中文系主任魏兴南来访，问起吴宓对学生大字报的意见，吴宓对一些大字报中牵强附会批判教师的文字进行辩驳：“郑、荀等四人为学生写字以赠，其写‘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及‘先天下之忧而忧，……’似不为错误，前句可以毛主席当之，后句写一人之性行，非必即是忧1962中国之困迫，总之写者初未必有何深心，不当深文加谴，云云。——魏主任答：但何不写录毛主席语录或诗词，则可无讥矣。”（第七册462页）

魏主任的这一典型的“文革”式回答，真叫吴宓无言以对。第二天，就有对吴宓“深文加谴”更加厉害的大字报出现了。吴宓日记记载：“外语系汪兴荣之揭发，多纸，章节区别，书写工整，惟如宓恨吸纸烟人一条，彼插言‘毛主席亦吸烟者’，宓实未闻知，仍续宓前言云‘欲杀吸烟人之苦我者’，今乃指判为‘宓蓄意刺杀毛主席’则太严重矣……”（第七册463页）

从“恨吸纸烟人”联系到“毛主席亦吸烟者”（即“恨毛主席”），再进而将“欲杀吸烟人之苦我者”分析上纲为“蓄意刺杀毛主席”……后人若不知道“文革”中的诸多“反革命”罪名是怎样炮制出来的，看看吴宓这则日记就可明白大半。

吴宓当然深知学生这样的作为是被教唆出来的。他在7月26日日记中写道：“忆1923济在《学衡》中著论，谓今之中学生感情盛，意志强，而理智弱，知识、经验并乏，言论家（政客）惟事鼓荡，至若辈者弱者自杀、颓废，强者愤世嫉俗，今日本身受损，异时祸及国家社会，云云。又西人恒言：‘天下最危险之事，莫如以利刃置诸小儿之手，使之乱割，伤己伤人。’呜呼，四十年世变，至今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上之言验矣。”（第七册496—497页）

1967年1月7日：“下午2—5清洁劳动；宓从成君，共五人，扫除卫生科至小校门之一段马路，连同马路两边之广场沟渠等。该处聚集外来串连之红卫兵极众，尤其红卫小兵（小学学生），奔跑呼喊，跳荡狂掷，只知游戏，食甘蔗及糖，蔗皮及糖包纸随意弃投，满地皆是。吾不知如此幼稚之人物，其到处串连果有何益哉？”（第八册8页）

1967年3月14日：“闻诸队员述说：本队在地所种之莲花白菜一区，有儿童三四十人，成群结队来此，各持小刀，将莲花白菜每株均割断或割裂破碎，又从地中拔出，抛掷陇畔（若辈并不偷盗菜蔬，非为好利贪私，直是有意作践、破坏牛鬼蛇神之劳动成绩而已！）。按，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小几们无复教育，纵任其放恣横行，于此为极矣。”（第八册67—68页）

“纵任其放恣横行”，显然，吴宓当时就已经明白动乱的责任应由那上头的教唆者来负。可叹的是有不少人至今还未能认识到这一点。

◇ 思想精神决不改

1967年9月22日，吴宓在上午的小组学习会批判刘邓陶路线时“原拟发言，大意（1）最近学习后，始明刘邓陶之企图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之目的；前此完全茫然。（2）多年来，宓只知服从、遵行党国之一切政令及其人员（下至学校、系、组之小组长），不敢有违；又承受党国之诸多设施及条规（如《高教六十条》及注重学术、演唱旧剧等），辄喜其深合我心，因此感激党国之开明及仁惠，而不知其实出于刘邓陶等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毛主席思想者也！（3）自1966九月至1967四月初，宓写交述说、批判宓一生之‘罪行’之文章，凡数十万言，又曾重复两三次……今兹又须从头再写备交，宓实厌苦而无力为之矣！至于宓之‘罪行’，主要是顽固之封建思想，表现于《学衡》杂志中者，而与刘邓陶派实无任何牵连与关系也，云云。……然考虑之后，觉（i）今日宓尽可不发言，（ii）如此言之，对宓无益且甚有损害，故决定沉默不言。”（第八册258页）

过去感到“深合我心”的，在“文革”中都被当作“修正主义”批判了，吴宓对这样指白为黑的现实决不愿意“苟同”。他在1968年6月14日日记中又有一则类似记载。当天，吴宓读了造反派组织发下的“学习文件”《十七年来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之后，在日记中写道：“窃以为，凡当时宓等所喜悦、所认为正确、适宜之设施、文件，今皆贬斥为刘少奇路

线；且中国与苏联1959或1960方失和，前此之‘学习苏联’又岂得为罪哉？”（第八册478页）

1967年11月14日，中文系“牛鬼蛇神”教师小组在一起杂谈中，有人“讥斥近年中之传教士、救世堂、医院以及美国及英国庚款所办之事业如北平图书馆（清华当亦在内），又平民教育会（晏阳初主办）……”“皆美英等帝国主义豢养之走狗，以危害中国而反抗共党及解放者。”吴宓“不能复忍，乃微言……”作了简要的辩驳。他在当天日记中记下此事后写道：“按：诸君之说法，皆是‘站在正确之立场’，即是认定毛主席所主张、发动之阶级斗争、思想改造、文化革命皆是正确而必要，不容丝毫怀疑或反抗；然此在宓之思想与感情上，断断不能接受，不能屈从与苟同。幸今日宓未再发言。今后应更须坚忍而沉默，方可免祸耳。”（第八册297页）

1968年1月4日，教师“牛鬼蛇神”小组同仁劝告吴宓，“今兹自保、自救之术，首应与众混同，不可在服饰言动之任何小节，与一般人所别异”，“更论思想、立场、态度，则宓必须诚心认识自己过去一切之错误……必如此，然后方能望‘走到毛主席思想路线上来’，而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得免于覆亡之灾祸者也”。吴宓当晚在日记中记下此事后评说道：“按，诸君之劝告，亦是善意忠言。然若衣饰形貌之见于外者，宓尚可以改；其学术思想之在内心、精神者，宓实不愿改，且不能改也。祸福死生，听之而已矣！”（第八册345页）

1968年1月27日：“10时休息后，众围火盆坐，谈毛泽东思想及改造问题。宓自念（1）宓不及诸君之灵敏巧妙，善于表现，（2）宓又曾闻中西古今圣贤之教，多读文史典籍，宝爱中国及世界文明，不忍见其湮灭，故不能从诸君专诚一心，接受毛泽东思想，参加阶级斗争，故宓之思想改造实难，而前途之祸福未可知也！念此，忧心忡忡矣！”（第八册365页）

1968年2月16日，成文辉劝吴宓：“公之根本正路，只有经过学习毛主席思想，改造自己之世界观。公每日回家之后，如仍闭门离世，自读旧书，实非计之得者也。”吴宓当晚在日记中记录谈话要点后评论道：“归途自思，成君教宓之意，可感。然宓对中西古今学术文艺、道德政治之全盘思想（以及宓对天、对人、对物、对事之深固感情）焉能改造？宓在舍，得安居静处，不读旧书，则将作何事？”（第八册378页）

1968年6月7日，教师“牛鬼蛇神”小组同仁谈如何在两派斗争中“趋吉避凶之道”，特别对平时“开口便错”的吴宓进行规劝，“贺明元君只一语：劝宓今即每日读毛主席著作，作出笔记若干条，以后整理、编辑之为一篇，供大批判时、受斗争后，发言（自我批判）之用。”吴宓记下此语后写道：“宓按：贺君所劝教，极是。然宓殊不能降心、壹志以为此，大异1952之心与境矣。”（第八册470页）

吴宓的“反动立场”何等坚定！

◇ 直斥元凶

在1966年7月19日的日记中，吴宓就“含沙射影”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6时起。思‘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之理，古今应作何解。”（第七册489页）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吴宓越来越愤恨，他终于忍无可忍地在日记中写下了直接指斥毛泽东的言论。

1968年2月22日：“成君述其家况之艰窘，尤因文化大革命中秩序破坏，长女在南江

‘上山下乡’者，因其地骚乱，回家久居，工资未发，口粮为人取占。（贺君一子亦同）。二子初中毕业二载，迄未分发工作，皆闲居在家，故成君钱粮俱缺，赖本组同人济助，每日全家啜粥，杂以青菜，恒不能饱等情……”（第八册385页）

吴宓在这段话后面意味深长地写了一句加在括号里的感叹——“然称颂毛主席，毫无怨言”。

吴宓的好友凌道新（历史系“右派”教师）被罚在教师“劳改队”劳动，1968年6月1日，凌道新向吴宓诉说了被造反派“苛虐”管制的情形：“全日劳动”，“几次排队举大黑旗，敲锣鼓，游行校内及碛市”，“责令队员跪泥地上，并以钢条锄柄痛打队员若干人次，而新受打尤重且频。……更命新操杖击漆宗棠，怒其击之不重而酷打新焉。”吴宓在日记中记下这段血泪控诉后，怒不可遏地写下了自己的评语：“呜呼，人道何存？公理何在？毛主席应负其责也！”（第八册464—465页）

真是一声石破天惊的呐喊！

读到此处，使人不能不对吴宓这个被“革命左派”们视为“老学究”、“老废物”、“反动权威”的杰出学者肃然起敬。

~~~~~

#### 【解密档案】

#### 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的两个文件

• 刘振武 •

〔编者按：刘振武（1926年～1968年），男，广西博白县人。高中文化。194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区民政助理、组织干事、县民政科副科长、博白县凤山中学总务主任、文地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8年，他起草文件，指出当时的“派”性党中央，已经篡夺了党，军队和国家。为此遭到政治迫害，含冤病逝。〕

中国人民解放军  
玉林军分区政治部、司令部：

由中国人民的优良儿子所组成的“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在党的重要领导同志主持之下，最近在两广边境地区的秘密地点，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已经通过“宣言”和“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端的意见”等两个极为重要的文件。由于我们的条件特别困难，现在把这两个文件寄给你们。请求你们协助立即刊印和散发到全国各地去，送到一切有战争，有争论的地方的两派群众手里去，以便于正确地解决两派争端，找到共同的语言。

由于这两个文件，对解决两派争端，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你们在刊印的时候，务请由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检查校对，不要有任何只字标点符号的差错，以免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会议还在继续举行，将要通过的有“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团结”等三个极为重要的文件，以及会议的新闻公报等。这些文件，都需你们协助刊印散发，通过以后，将陆续寄给你们，请做一些必要的物质准备。

在新闻公报上，我们将公开我们的组织，及其主要的组织成员，以便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道，为克服我党当前所面临的严重困难，作出自己的贡献。

此致

革命敬礼

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

1968.7.21.

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

第一号文件

宣 言

当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困难的严重的关键时刻，由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所组成的“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胜利诞生了。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同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一道，为克服我党当前面临的严重困难，为挽救我们党所领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不被彻底破坏，为挽救祖国人民免除分裂、内战的疾苦，而开展伟大的保党反“派”的正义斗争。并争取这个斗争，取得最后的完全的胜利，以实现祖国的重新统一与团结和平。

(一)

我们所需要保的党，就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打倒了反动的蒋介石王朝，取得了中国革命胜利，接着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共产党。

我们所需要保的党，就是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这届中央委员会，集中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最优秀的儿子，他们是我们党的，七亿中国人民的最宝贵的共同财富，他们是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最能联系群众的，最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最富于领导才能和指挥才能的，最有经验的天才的领导集团。只有这样一个领导集团，才能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完全正确的领导。

但是，使我们万分沉痛的是，这样一个优秀的领导集团，近两三年来，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破坏。以这个集团为主体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权力被窃据，因而，使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失去了完全正确的领导。使我们的党完全瘫痪，完全瓦解，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和领导能力。使我们的国家处于群龙无首的，全国性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空前未有的无政府状态。我们的刚刚从经济困难中恢复起来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事业，又一次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大破坏。使我国又一次面临从来未有的严重困难。所以，保证恢复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实行正确领导的全部权力，是摆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的，最迫切的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不是这样，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将丧失了社会主义的前途，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了一切。如果，不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问题，那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而变成历史的不可饶恕的罪人。

(二)

我们所需要坚决反对的“派”，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挟持领袖，从正确的党的八届中央分裂出去的，彻底地破坏了党的“个人服从组织”和“少数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的，自搞小组织，自封“党中央”的，由极少数的几个人组成的“派”，及其自封的“派”性中央。

这个“派”性中央，已经篡夺了党，篡夺了军队，篡夺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派”性中央，已经推翻了正确的党的八届中央的正确领导，全部地篡夺了她的职权；并且利用八届中央在人民群众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骑在八届中央的头上，发号施令，作威作福，不可一世。

这个“派”性中央，近几年来，一直以个人的恩怨为标准，系统推行了一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亦即“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的、“任人唯亲”的张国焘式的派别路线，彻底地摧毁了我党的干部路线和组织路线，肆无忌惮地，根本推翻了党纲党章的具体规定，打击了许许多多的，党的、国家的、军队的、企业事业单位的极为重要的领导同志。空前未有地糟蹋了作为我们的党、国家和军队所赖以生存、赖以发展、赖以建设的领导队伍和干部队伍，使我们的党和国家变成了一条软骨蛇。

这个“派”性中央，专门生产政治帽子，诸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黑线、黑帮……等等，辱己辱人的产品，全力推销。但是，却从未问过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从不关心整个国计民生，从不体贴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

这个“派”性中央，根据自己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需要，破费国家的无可计数的巨大财富，巧立各种名堂，从社会上搜罗一些不明真象的人，蒙蔽和欺骗他们去支持他们自己。凡是上了大当，盲目支持他们的派别路线和派别政策的人，就一律被封为所谓“造反”派，凡是不支持他们的错误政策的人，都一律被贬为什么“保守”派，甚至是“反革命”。系统地实行了支一派、压一派的派性政策！公开策动政变性的遭及全国各地的大内战和大分裂。

这个“派”性中央，亲手把枪枝、弹药以及“打倒”、“推翻”、“消灭”、“砸烂公检法”等等完全是对敌才能使用的武器，散发给上了他们的大当，受了他们蒙蔽的人。这样，就导致了全国性的，从来未有的大破坏、大屠杀、大流血、大混战。所谓挑起武斗的黑手、黑后台、黑指挥等等，恰恰正是这个“派”性中央。这个“派”性中央，已经完全毒化了我们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干部的团结，人民群众的团结和军民之间的团结。已经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引进了分裂内战、经济萧条、人民苦难的死胡同。

### （三）

这个“派”性中央，很狡猾、很阴险、很毒辣。它通过各种乔装，披着各种画皮，偷偷地躲在我们的敬爱的领袖身边。我们万分沉痛地看到，直到现在，我们的领袖，都还没有发现这个“派”性中央的原形和本质。直到现在都还没有知道，这个“派”性中央给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整个工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建国以来，从来未有的大破坏和从来未有的大损失。

这个“派”性中央，挟持领袖，使用“愚君害主”的种种阴谋手段，贩运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货，明目张胆地公开发售。几年以来，这个“派”性中央，所说的，所做的，无不充满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色彩。

这个“派”性中央，有一条要人们尽忠的所谓“革命路线”，这条“革命路线”，到底是什

么样的货色呢？这就是“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打倒你的，就是革命”。这条“革命路线”，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提出，到1966年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才完善化系统化的。这条路线的实质，就是张国焘式的“任人唯亲”的派别路线。提出这条路线的人，从根本上推翻了的无产阶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马列主义的革命原理，以资产阶级的个人独裁的灵魂，偷换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因此，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的，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根本的政治制度的。这个“派”性中央，亲手把这条反马列主义的所谓“革命路线”，传给上了他们的大当，盲目支持他们的“造反”派，并且要这个“派”身体力行。而被贬为“保守”派的人，则为了保卫自己的需要，也从“派”性中央手里，夺过这条所谓“革命路线”，从而就形成了全国性的两派的对立。你要吃掉我，我也要吃掉你，形势十分尖锐。由此，即产生了遍及整个祖国国土的流血内战，“派”性中央，号召人们忠于这样的“革命路线”，实质上就是号召人们忠于流血、忠于死亡，忠于内战，同忠于祖国和无产阶级的最后分裂，“其用心何其毒也”。

这个“派”性中央，有一套“四个伟大”的圣人论。这一套“四个伟大”的圣人论，如果不是封建社会的“愚君害主”的黑手理论，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论，都是反对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最伟大的马列主义大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来都没有说过，世界上会有“完整无缺，始终如一”的圣人。1958年以后，几年的经济困难，最近两三年来，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没有得到任何正确的解决，这就更加证明“四个伟大”的圣人论，没有任何客观的依据。提出“四个伟大”的圣人论的人，无非是要在世界上，模拟出一个“完整无缺，始终如一”的圣人，强迫人们去盲目崇拜，以掩盖自己的篡党、篡国、篡军、实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事实。“其用心又何其毒也”。

这个“派”性中央，利用曾经有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思想作掩护。系统地实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也就是封建主义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愚兵的反动哲学；这个“派”性中央，也象无产阶级的大叛徒张国焘一样，利用人民群众不知道无产阶级政党的，“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和“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的弱点，系统地实行“做个人好战士”、“个人高于一切”和“个人决定一切”的，也就是资产阶级的私国、私党、私军的窃国政策；系统地实行“三忠于个人”的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军、役民的奴化政策，为了配合上述政策的需要，又系统地实行一本书、一出戏、一首歌的文化教育政策。所有这一切，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不是背叛无产阶级，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话，那是绝对不会这样干的。人们应该好好想一想，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怎么会去推翻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的最根本的党性原则呢？怎么会去推翻无产阶级政党的“个人服从组织”和“少数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呢？怎么会去推翻民主集中制，这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呢？怎么会去推翻无产阶级的“党委领导一切”、“党委集体领导制”和“集体领袖制”呢？可见，实行一系列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愚民愚兵政策、奴化政策、窃国政策的“派”性中央，其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了。

#### （四）

这个“派”性中央，以宏篇大论，咒骂“修养”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可是，就是这个“派”性中央，公开号召砸烂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公安政法部门。并且公开说：“公检法一垮台，我就高兴。”同志们应该想一想，这些话，如果不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怀有刻骨仇恨的人，究竟怎么能够说得出口呢？

这个“派”性中央，有一个特别的性格，这就是昨天还称这个同志是“亲密的战友”，后天则突然宣布这个同志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昨天亲手提拔起来的干部，今天则突然下令撤职，

一脚踢开。对这种神昏颠倒的行为，我们一言以蔽之，曰：反复无常，法无定见。

这个“派”性中央，还有一个性格，就是发动大串连的是他，下令禁止串连的也是他；叫喊“两个阶级大搏斗”的是他，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的也是他；大喊“支持左派”的是他，下令“不支派”的也是他。对这种特殊性格，我们又一言以蔽之，曰：朝令夕改，早话晚忘。

这个“派”性中央，大喊立新功的是他，天天卖旧货的也是他；带头在党的八届中央搞分裂的是他，大喊两派实现大联合的也是他；从根本上拒绝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是他，大教别人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的也是他。对于这种奇怪的言行，我们称之为：言行不一，文过饰非。

这个“派”性中央的感情很反常。当1957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刚刚建立基础的时候，他又要“跃进”了。当出现了三年的严重的经济困难，水肿病人成堆的时候，他却高呼“胜利”了。当我们全党、全民举国上下，一致努力，克服了经济困难，刚刚过得日子的时候，他却又发怒了，又要“革命”了，当整个城乡的生产，受到空前的破坏的时候，他却又欢呼“永远健康”了。甚至在连布票都发不出去的严重情况下，他竟闭着眼说：损失“最小最小最小”，同志们应该想一想，当这种情况发展到“最大最大最大”的时候，那么，七亿中国人民还会有半条裤子么？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本来就实行着派别路线，贯彻着派性政策，本来就专门靠撒播仇恨种子为职业，那么，怎么能够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正确地解决遍及全国各地的两派争端，从而实现真正的两派革命的大联合呢？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本来就是目无党纪国法的，破坏党纲党章，破坏国家宪法的，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派”，那么，怎么能够有效地克服遍及全国各地的，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状态呢？怎么会能够领导出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民主、有自由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呢？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本来就是靠“永远健康”过日子。专门贩卖政治帽子为职业，那么，怎么会晓得人民群众是靠穿衣吃饭过日子，从而过问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过问国民生计，关心人民疾苦呢？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本来就是反复无常，法无定见的人；本来就是朝令夕改，早话晚忘的人；本来就是言行不一，文过饰非的人；本来就是“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把一切成功归于自己，把一切失败归于别人。”的，实行私党、私国政策的最自私、最自利的人，那么，依靠这样的人，怎么能在七亿人民的思想中，树立起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大公无私的思想呢？怎么能统一七亿人民的意志，并且给他们指出正确的前进方向呢？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已经打击了许许多多的领导干部，已经把我们党的领导队伍和干部队伍糟踏得不成样子，并且把许许多多的人，打成“保守”派，那么，依靠这样一个“派”性中央，怎么能团结干部的绝大多数，并且通过他们去团结全国人民，以建设我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呢？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本来就是靠卖旧货、论前功过日子，并且早已被“伟大前功”的沉重包袱，压得连气都透不过来，那么，这样一个“派”性中央，怎么会有半点力量，领导七亿中国人民，去开辟新的前途，创造新的业绩，建立新的功勋呢？

请问：在一个“派”性中央面前，在我们的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里，

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反革命黑帮、黑线；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叛徒、特务、土匪绿林；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怎么会出现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完整无缺的圣人呢？

## （五）

受了“派”性中央的圣人论的蒙蔽和欺骗的青年人，出于对党的“个人服从组织”和“少数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的无知，出于对党中央的爱戴和拥护的善良愿望，听说要保卫党中央就一哄而起，一拥而上。这种精神，本来是可嘉的。但是，这种可贵的革命精神，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保了从党的八届中央分裂出来的一个“派”，并且错误地保了这个“派”篡党、篡国、篡军的“贼赃”。同志们，应该想一想，难道八届中央的绝对多数的成员，会起来反对党中央，从而自己反对自己么？头脑简单，缺乏政治生活经验的青年人，显然你们已经上了大当啦！

这个“派”性中央，自吹开辟了什么“革命航道”，号召青年人要跟着游上去。这到底是那么一回事呢？原来这一条所谓“革命航道”，早已被一排又一排，一列又一列，一层又一层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黑帮、黑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大小小的和不大不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牛鬼蛇神、叛徒、土匪……等等，严严实实地、密密麻麻地、结结当当地把这条所谓“革命航道”堵死了。你们永远永远都不可能游得过去，爬得过去，跟得上去了。人家在这条“革命航道”上游了几十年，跟了一辈子，到头来还落得是一个“反革命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难道你们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才迟迟跟上，会运气好一些，而能够捞到半点油水么？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对，“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鲁迅先生反说，“路本来是没有的，人行多了便成了路”。上了大当的青年人，还是回过头来吧！自己走自己的路，可能会稳当些，安心地多读些书，可能会得益多些。

我们诚恳地劝告那些盲目地跟在“派”性中央身边的，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那些人，在一系列严酷的事实面前，你们到底有什么理由，敢保证自己不是“黑帮、黑线、黑后台”呢？你们到底有什么理由，敢保证自己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呢？你们到底有什么理由，敢不提防“背后一刀”呢？你们到底有什么理由，敢不怕同那些以前功饰后过的，完全脱离了群众的人一起，终归被人民群众所唾弃，而被送进历史的垃圾堆呢？

近十年来，我们从这个“派”性中央手里，除了得到破坏、贫困、仇恨、分裂、内战之外，别的东西，则一样也没有得到。从党的利益出发，从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利益出发，从七亿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我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彻底地清算这个“派”性中央的严重错误，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严重时刻了。否则，我们大家都将成为对党、对无产阶级、对祖国不忠的历史罪人。

当前，帮助党的八届中央，克服“派”性中央的分裂破坏活动，促进八届中央的全体成员，在党的、无产阶级的、祖国的、社会主义的、伟大的七亿人民的共同利益面前，重新实现大团结，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把被人们“打倒”了，“推翻”了，“砸烂”了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重新扶起来，并坚决地支持她实现其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正确领导，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希望和共同前途。

## （六）

我们郑重地向全党、全军、全中国人民严正宣告：

一、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的国家；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和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部队；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无产阶级和七亿中国人民的共同的事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如果有人把我们的国家和军队当成某一个人的私有财产，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当成某一个人复辟封建主义的御用工具；把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成某一个人的私人事业，那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是绝对通不过的，是完全枉费心机的，是绝对徒劳的。

二、我们不承认任何个人，有权篡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任意“打倒”和“推翻”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任何一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我们不承认任何个人，有权篡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任意“打倒”和“推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任命的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

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的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在党纲党章的制约之下活动。如果，有人破坏党的“个人服从组织”和“少数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自搞小组织，自封“党中央”，这就叫做反党。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必须立即对这种反党案件，进行检查。并且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报告。由大会作出相应的结论。我们希望中共中央监委，绝对不要无视我们的意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的任何一个公民，都必须遵守国家宪法。如果，有人篡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任意推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任命的国家领导人，这就叫做篡国政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必须立即对这种篡国政变案件进行检察，并且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报告。由大会作出相应的结论。我们希望最高人民检察院，绝对不要无视我们的意见。

四、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部队；是保卫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部队；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不被破坏的部队；是保卫祖国国防不被侵犯的部队。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的军队、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我们绝对不能承认，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拿人民的钱的人民子弟兵，被骗去充当什么“个人的好战士”。

因此，我们坚决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立即把保卫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权力不被篡夺的责任担负起来，并保证每一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能够顺利地行使党所赋予他的神圣职权。

我们坚决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立即把保卫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不被篡夺的责任担负起来，并保证每一个国家领导人，能够顺利地行使全国人民所赋予他的神圣职权。

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竟然置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于不顾，竟然放弃自己保卫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神圣天职，把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变成别人篡党、篡国，实行封建主义复辟政变的御用工具，而继续去充当什么“个人的好战士”，那末，其主要军事领导人，必须承担叛党、叛国的罪责，并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我们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参谋部、北京市卫戍区司令部，都绝对不要无视我们的意见。

五、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坚定不移地相信，以自己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伟大

的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无限忠于祖国人民的模范行动，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道，果敢、坚定地去纠正任何伟大人物的错误。正如我们党的历史上，多次纠正领导的错误一样。现在，如果还有人怀疑这一点，那就只能证明他没有半点的政治远见。

六、我们真诚地，赤胆忠肝地衷心希望那些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能够以党的利益为重，能够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能够以祖国及其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利益为重，从完全错误的道路上回过头来。我们感到你们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太远了。我们感到你们在张国焘的旧路上走得太远了。

这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在几十年来，对缔造我们伟大的党、缔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中国革命的伟大的成果，都作出了极为杰出的贡献。对中国人民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对革命前辈著下的丰功伟绩，我们总是当做最珍贵的财富，来备加爱护的。我们正是从保卫这些同志的光荣的、伟大的革命历史出发，才去批评同志的错误的。我们希望通过批评错误的事，去教育犯了错误的人，从而使这些同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显然我们是对事不对人的。

我们充分意识到，帮助自己的同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是自己对党、对同志尽忠的表现。而犯了错误的同志，能够认识，能够改正，则是我们全党的幸运，全中国人民的幸运，也是改正了错误的同志的最大的光荣。因此，我们衷心希望犯了错误的同志，能够放弃一切个人的恩怨成见，认真珍重一切改正错误的良好时机。

七、“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都是“派”性中央手里的各有用处的两件工具，都是为“派”性中央的“两个阶级大搏斗”的错误理论服务的。因此，参加两个派别组织的人，都是受蒙蔽的，上了大当的。所以，各地驻军、人民武装部门、公安政法机关，都必须切实负起自己的责任，认真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保障一切受蒙蔽、受欺骗而上了大当的革命知识分子、革命青年学生、革命教职员工、革命干部（包括领导干部）、革命工农群众的人身安全。切实帮助受蒙蔽、受欺骗的同志，提高政治思想觉悟，鼓励他们反戈一击，起义归队，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人民群众和整个无产阶级队伍，重新实现真正的革命大团结的根本利益所在。而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又是唯一正确的政治措施。因此，绝对不能有任何对受蒙蔽、受欺骗的人，实行打击报复，伤害人身安全的错误事件发生。各地驻军、人民武装部门、公安政法机关，都要切实保障每一个公民，能够顺利度过由于“派”性中央的错误政策，一而造成的暂时困难。并率领他们团结一致地、参加到伟大的保党反“派”的正义斗争的队伍中来。

同志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吧！  
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通过

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

第二号文件

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端的意见

现在全国各地的两派争端，都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互相仇恨的情绪，还很严重。有的地方。流血内战正在激烈地进行，有的地方，正在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流血战争。对这种破坏祖国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破坏城乡工农业生产，给人民群众带来无穷无尽的苦难的流血大内战，我们全党、全军、七亿中国人民，都感到无比的关切。停止内战，恢复和平，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最迫切的共同要求。我们认为，站在无产阶级的即党的立场上，采取正确的方针，通过两派协商，妥善地解决两派争端，争取整个无产阶级队伍，重新实现真正的大团结，争取整个祖国国土，重新实现真正的和平，是我国人民当前面临的最严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

我们认为，两派都是错误的。但是，他们的错误性质又是有原则性的区别的。具体说来，“造反”派的错误是严重的，但他们又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是无罪的。“保守”派是有错误的，但又恰恰是我们所需要坚决地加以保护的。

## （一）

为什么说，两派都是错误的呢？

一，两派都在错误的立场上，帮助“派”性中央，推翻了对全国人民所衷心拥护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推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最根本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帮助了“派”性中央，篡夺了党的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为“派”性中央，复辟封建主义的“君主治国”的制度，鸣锣开道，使我国人民丧失了一个完全正确的领导核心——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二、两派的斗争大方向都是错误的。两派都错误地把“派”性中央，根据他们分裂党的八届中央的需要所制定的，“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打倒你的，就是革命”的派性路线，当作是什么“革命路线”来贯彻实行。结果，两派都把自己当成是唯一的革命者，都要把同自己对立的一派打成“反革命”。从而导致了全国性的大分裂、大流血、大内战。使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大破坏。如果，我们把“派”性中央比做一块大石头的话，两派都是被压在这块石头底下的两条大黄瓜。不过一条被压在上面，一条被压在底下。在上面的一条，既感到石压瓜，又感到下面的瓜顶瓜，其所受的压力就特别重。在下面的一条瓜，没有直接感到石头的压力，仅仅感到瓜的压力，因而，反抗也就特别强烈。正是因为这样，就出现了瓜压瓜，瓜顶瓜的矛盾和争端。这就是两派争端的性质。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如果不揭开“派”性中央的错误路线，不把“派”性中央这块大石头搬开，那就势必两瓜都将压扁在这块大石头的底下，谁也战胜不了谁。这一简单的道理，可惜至今两派都还不知道。

三、两派都使用了民兵枪枝，都破费了国家的大量财富，只不过是有多多少少的不同而已。两派都没有坚决地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置于一切派别的利益之上。两派都没有把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人民群众的团结，当做我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来看待。

此外，当然还有别的错误，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 （二）

为什么说，“造反”派的错误是严重的呢？

受“派”性中央的直接支持，帮助从党的八届中央分裂出来的一个“派”性中央，实行封建主义的“君主治国”的制度，推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最根本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并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帮助了“派”性中央，以资产阶级的“个人高于一切”的武器，推翻了的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的最根本的党性原则，帮助“派”性中央，以资产阶级的“个人领导一切”的武器，推翻了的无产阶级的“党委领导一切”的根本制度；帮助“派”性中央，

以资产阶级的“个人决定一切”的武器，推翻了无产阶级的“个人服从组织”和“少数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帮助“派”性中央，推行国民党的“以我代党，一个领袖”的那一套，推翻了无产阶级的党委集体领导制和集体领袖制；运用“派”性中央散发下来的“砸烂公检法”的武器，冲击和削弱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公安司法部门；帮助“派”性中央，在“做个人好战士”的幌子下，以资产阶级的“枪指挥党”的制度，推翻了无产阶级的“党指挥枪”的制度，并且取代了各级党委的权力和地位。总之，帮助“派”性中央，以革命之名，行复辟封建主义之实。所有这一切，怎么能算不错呢？不仅是错，而且就其性质来说，是十分严重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内部这样做，只能被认为是复辟封建主义的政变暴乱。但是，这种暴乱，是“派”性中央挟持领袖，公开发动的。因而，直至今天，都还没有人认真研究其性质，还有更多的人，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罢了。

“造反”派的错误，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错误，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错误根源也只有一个。这就都是受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封建主义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哲学的毒害而引起的，都是受了“做个人好战士”和“三忠于个人”的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兵、役民的奴化政策的欺骗而造成的。因此，他们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是无罪的。

所有受蒙蔽的人，大多数都是我们无产阶级队伍的人，他们都是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他们当中的年轻人还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因此，我们对待受了蒙蔽的人，绝对不能采取镇压的措施和仇恨的态度。因为，当他们发现自己受了蒙蔽，上了大当的时候，他们是会痛苦的。在我们的百般热情的鼓舞和帮助之下，相信他们是会觉悟过来的。因此，如果我们不愿意从反面来帮助“派”性中央，加强其在群众中的阵地，认真珍重无产阶级队伍的重新团结的话，采取正确的政治措施，欢迎受了蒙蔽的同志，回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是完全必要的。

受了蒙蔽的同志，当他们发现自己头上的“党中央”，只不过是八届中央的正确多数中，分裂出来的一个“派”的时候，在大批党的、国家的、军队的优秀领导干部被撤职、被推翻；大批解放军指战员倒在内战战场的血泊里；青年学生应该分配工作的，分配不出去，应该升学的，无学可升；国家破坏，内战不息，人民困难等等严重的事实面前，相信他们会发现受损失的，恰恰正是他们自己。受损失的正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人民群众和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铁案如山的事实面前，相信他们是会把受损失的总的根源检查出来的。因而，他们就有可能会很快出现一个政治思想上的大觉悟、大进步、大提高的飞跃过程。如果，我们不预见到这一点，就不是有远见的革命者。

### （三）

至于被“派”性中央贬为“保守”派的，为什么恰恰是我们所需要坚决加以保护的呢？

因为，他们往往是我们的各级干部的大多数，是我们党的、国家的、军队的、企业事业单位的、文化教育卫生部门的重要的领导力量。是我们党所领导的干部队伍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在几十年或十几年来，国家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作出了自己的极为宝贵的贡献。他们为克服三年的经济困难，都尽到了自己的最大的努力。公安政法部门，他们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为维护社会主义的社会治安，都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他们富于领导才能和组织才能。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过程中，同广大的人民群众，有过极为密切的联系。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是我们党的、国家的极为重要的宝贵财富。如果，我们不去认真地保护他们，那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不难设想，目前的“造反”派，能够有力量担负得起他们的繁重的任务，能够取代得了他们的地位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不难想见，我们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

国家、这样多的人民，这样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离开了他们，是能够设想的吗？如果我们不打算彻底地毁灭整个国家的话，那末，正确地对待他们，则是完全必要的。

不能否认，“保守”派是有错误的，甚至某些错误还是十分严重的。但是，他们的错误，同人民解放军的错误，“造反”派的错误一样，都是由于上头的“派”性中央的错误领导，所一手造成的。因此，片面地责怪他们，无论如何，都是不正确的。

最近两三年来，由于上头的“派”性中央的错误领导，为挟持领袖，举行复辟政变制造舆论的需要，无限度地破费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大量的国家财富，去接待自己的客人。所有这些，所谓“保守”派的同志是看在眼里，想在心上的。他们对这种情况是早就心怀不满的，他们的这种正当的不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原谅的。

当“派”性中央为了支持自己的需要，而封出了所谓“造反”派以后，上头的“派”性中央即通过“造反”派，把一大堆完全是敌对性的口号，诸如“打倒”、“消灭”、“推翻”、“砸烂公检法”等等，直至枪枝、弹药来对待他们。此外，“派”性中央还直接公开出面，把一块又一块的大石头，压在他们的头上。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尽管他们对受蒙蔽的人开枪是不对的。但是，他们在敌对性的行动面前，采取敌对手段，予以还击，这在逻辑上是完全说得过去的。所以，这些错误的罪责，应由“派”性中央直接承担。如果，片面地推在“保守”派的身上，显然是不公道的，也是不应该的。

有人说，“保守”派是群众反对的，“造反”派是受群众欢迎的。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也应该做具体的分析。

近几年来，由于上头的“派”性中央，一直忙于搞封建主义的复辟政变，根本就无心过问国计民生、人民疾苦。这种情况，群众是不完全了解的。由于群众的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因而，错怪下面的所谓“保守”派，这是难以避免的。加上他们自己身上存在某些缺点错误，引起群众的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当一旦恢复了党的八届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国计民生的重大责任担负起来，逐步地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相信他们是会重新得到群众的拥护的。群众支持“造反”派，是要向他们要饭吃的。如果他们也跟“派”性中央一样，不过问国计民生，不关心人民疾苦，那末，群众也是会很快地就抛弃他们的。因此，如果我们不是科学地、有分析地而是片面地看待问题，那我们就一定要犯特大的错误。

我们这样客观地、有分析地评价“保守”派，绝对不能成为“保守”派镇压或排挤“造反”派的理由，和同中国人民解放军闹分裂、闹对立的理由，而“保守”派、“造反”派、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互相紧密合作，团结一致地去揭发“派”性中央的一系列的严重错误，是克服我党当前所面临的严重困难，找到共同的语言。

应该指出，“保守”派有的错误，是应该立即纠正的。比如，有的地方的“保守”派，竟杀人、放火、放毒、甚至颠倒是非，嫁罪于人等等，都有所出现。有的地方，则殴斗不同观点的干部，开除不同观点的职工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脱离群众的，是不得人心的。这些错误做法，既帮助了“派”性中央加强其在群众中的阵地，又帮助了“派”性中央找到了压迫自己和支持“造反”派的理由，从而加深了分裂。因此，它是害人的，又是害己的。是十分愚蠢的。所以，我们郑重地希望，犯有这类错误的同志，应该以党的利益为重，坚决地彻底地改正过来。

#### （四）

其实，犯了错误的，并不仅仅是这一派或那一派。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各派群众，

都犯了一个普遍性的共同的特大错误。这就是，以一个能够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实行正确领导的，为全国人民所衷心拥护的党的八届中央，换得了一个对谁都没有利益的，复辟封建主义的龙袍加身的“派”性中央；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各级党委，换得了一个对谁都没有用处的，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委员会”。尽管全国人民都费尽了力气、付出了无穷无尽的“永远健康”的巨大代价，所换来的仍然是仇恨、分裂、流血、内战。工人无工做，学生无书读，知识青年分配不了工作，病人无药可医，农民没有化肥种田，干部被斗殴受伤、死亡，解放军战士流血牺牲，戏院关门，影院倒闭，商店的布匹、煤油、火柴及其他日用品相继断市。总之，城市破坏，乡村萧条。全国七亿人民的心头，都蒙上了一层又一层乌云，看不到自己的半点的光明的前途出路。全国人民都犯了这样一个大错误，真是“史无前例”的啊！

所以，现在摆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的严重任务，并不是互相争吵，互相仇恨，互相攻击，互相吃掉，自相残杀。而恰恰相反，正是要重新团结起来，以友谊代替仇恨，以团结代替分裂，手挽手、肩并肩地，毅然、决然、勇敢、果断地，立即开展全民性的对“派”性中央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的大揭发、大批判。坚定不移地把以“永远健康”为代表的一小撮，挟持领袖，分裂中央，实行篡党、篡军、篡国的复辟封建主义的原形和本质，彻底地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坚定不移地捍卫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重新行使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所赋予她的神圣职权。并全力以赴地保证其实现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正确领导。只有这样，才能保卫我们伟大的党及其所领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只有这样，才会有七亿人民的幸福及其光明远大的前途。

## （五）

“派”性中央的那些东西，必须立即展开大批判呢？

“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打倒你的，就是革命。”这是一条张国焘式的分裂党，分裂人民的叛党的派别路线。这是“派”性中央，从根本上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革命原理而提出来的，是根据他们分裂八届中央，实行篡党、篡国、篡军，复辟封建主义的需要而提出来的。这条派别路线，已经完全毒化了我国的政治气氛。现在全国各地两派所执行的，都是这样一条派别路线。你要吃掉我，我也要吃掉你，互相进攻，各不退让。如果，不彻底地批判这条派别路线，就不可能彻底刷清“派”性中央，所强加给“保守”派身上的种种政治侮辱，及其在群众中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就不可能有效地帮助受蒙蔽的“造反”派，提高觉悟，起义归队。总之，一句话，绝对不可能正确地解决两派的争端问题。而军队战军队，干部战干部，群众战群众，这是七亿中国人民看不到尽头的苦难啊！

“政治第一”论，实质上就是“个人第一”、“个人高于一切”、“个人决定一切”的，封建主义的“君主治国”的理论。它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一最根本的哲学原理的。是从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党委领导一切”的革命原理的。如果，不开展对“政治第一”论的批判，就不可能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面光焰无际的伟大红旗，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就可能完全变质，伟大的祖国前途，就有可能向封建社会倒退。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是封建王朝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哲学的翻版。是“派”性中央，为复辟封建主义的需要而提出来的。这一套愚民愚兵的哲学，已经把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蒙蔽过去了。很多军事领导干部被撤职，很多战士流血牺牲，至今都还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这套愚民哲学，已经把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的心窍堵死了，至今都还没有人知道祖国分裂内战的根源。如果，不对这套封建主义的愚民哲学，开展大批判，就不

可能有七亿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的大解放、大觉悟、大进步、大提高；就不可能把七亿中国人民的智慧挖掘出来，并把它引导到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派”性中央，复辟封建主义的企图，就可能得逞；伟大的祖国，就没有社会主义前途。

“做个人好战士”、“三忠于个人”，是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军、役民的奴化政策。所有这一切，都是“派”性中央，实现其窃国阴谋，复辟封建主义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如果，我们不敢毅然、决然地开展对所有封建主义的一切的大批判，就不可能捍卫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的最根本的党性原则，就不可能捍卫无产阶级政党的最根本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就有可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置于“封建皇君”的统治之下，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所换来的革命成果，就有彻底失掉的危险。

“四个伟大”、“万寿无疆”，是封建王朝的“奸臣宰相”的“愚君害主，弄权祸国”的黑手理论。在无产阶级内部端出这样的理论的人，无非是把无产阶级的领袖，蒙蔽过去，腐蚀过去，以便于自己偷偷地披着“永远健康”的龙袍，登上“万寿无疆”的宝殿上去，全面地复辟封建主义。如果，我们不敢对所有这一切封建主义的陈腔，开展批判，就不可能最充分地发扬我国七亿人民的国家主人翁的革命精神，勤劳勇敢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本书、一出戏、一首歌的文化教育政策，是“派”性中央的愚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派”性中央篡党、篡国、篡军的重要的阴谋手段。因此，也必须开展坚决的批判。如果我们不敢开展对复辟封建主义的愚民性的一本书、一出戏、一首歌的文化教育政策的批判，就不可能有百花齐放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文化，就不可能满足七亿人民的广泛的文化生活的精神要求。

亲爱的同志们，现在是我们对“派”性中央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以及一切复辟封建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开展大揭发、大批判的时候了。如果，我们放松了对“派”性中央的完全错误的一切的批判，而再争下去，再打下去，再战下去，那末，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就要完蛋了。而这，仅仅只能使美国帝国主义者高兴。亲爱的同志们，清醒过来吧！

## （六）

我们呼吁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立即在各军种、各兵种的班排里，开展对“派”性中央的一切复辟封建主义的路线、理论和政策的大揭发、大批判。最有效、最迅速、最彻底地肃清“派”性中央所强加给广大指战员的蒙蔽和思想毒害。切切实实地，把保卫党的最高权力不被篡夺，保卫国家的最高权力不被篡夺的责任担负起来，把保卫党中央的全部成员和全部国家领导人员顺利行使职权的责任担负起来。我们坚决不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的任何个人，有任意推翻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的特权。中国人民解放军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绝对不能容许去充当窃国者的什么“个人好战士”。如果，你们是封建皇朝的皇家兵，那不管你是做谁家的好战士，我们是管不着的，也是无权过问的，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首先回到重新团结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周围。以自己的模范的行动，号召全国人民从各个地方、各个角落、迅速地回到党的八届中央的周围，回到以我为伟大旗手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红旗之下，以便于实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重新大团结，顺利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前绝对不能片面地支持这一派或那一派，而应该以自己受蒙蔽、受欺骗的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两派群众和干部，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引导他们立即参加对“派”性中央开展大批判的伟大斗争；参加保卫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伟大斗争。及时地

把两派完全错误的斗争矛头，扭转到正确的方面来。

### （七）

我们呼吁正在互相交火、互相争吵的两派同志，应该立即停止永远没有完结、没有前途、没有胜利希望的，自相残杀的战斗。立即主动地把自己的武器封存起来。（待到两派实现了真正的大联合和大团结以后，再由军事领导机关，同时把两派武器收回国防仓库）。必须认识，坚决地批判从八届中央分裂出来的“派”性中央的完全错误的一切，坚决地保卫党的八届中央重新实现其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正确领导，才是两派的共同利益，才是七亿人民的共同希望和共同前途。

因此，我们建议两派同志，立即把被自己“打倒”了的领导同志，不问其观点和派别如何，一律送回到原来的领导岗位上去。因为，他们都是“派”性中央的错误政策的受害者。因此，我们就有责任保护他们，并支持他们做好自己的工作。如果，个别确实有错误的，也应该由上一级党委的监察机关去处理，绝对不能由个人或派性组织去处理。此外，两派必须立即把被自己一方关入监狱的对方同志，无条件地释放出来；把被自己一方斗殴成伤的对方同志，加以切实的医治，迅速恢复其健康；把被自己一方赶走了的对方同志，一律欢迎他们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双方都要撤销对对方实行经济封锁的错误措施。以畅通城乡经济和物资交流。两派都要放弃自己的派别利益和派性立场。从完全错误的组织里面，回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总之，双方都要主动采取一切正确有效措施，来消除两派之间的分歧，互相尊重对方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以友谊代替仇恨，以团结代替分裂。保证两派在伟大的保党反“派”斗争中，重新团结起来。

必须认识，“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都是“派”性中央手里的各有用的两件宝贝。两派组织都是为“派”性中央的“两个阶级大搏斗”的完全错误的理论服务的。因此，两派组织都是分裂我党的无产阶级队伍的极为有害的毒剂。在批判“派”性中央的错误的同时，放弃和取消这些组织是完全必要的。

必须明白，我们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的工会、共青团、妇代会、农民协会、学生会等等，离开无产阶级的这一系列的阶级组织，去另起炉灶，成立别的组织，都被认为是分裂无产阶级队伍的派别组织，必须开展批判。因此，我们呼吁两派同志同时放弃自己的派性组织，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点，我们希望得到两派同志的热烈赞同。

### （八）

我国面临“两条道路，两个阶级大搏斗”的事实是存在的。不过，不是在下面，而恰恰正是存在于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内部。这就是八届中央的正确多数，同挟持领袖，自搞小组织，自封“党中央”的“派”性少数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同资产阶级的“个人高于一切”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同资产阶级的个人独裁制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同资产阶级的“枪指挥党”的斗争，是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军、役民的“三忠于个人”的奴化政策，同无产阶级的忠于党，忠于无产阶级，忠于祖国及其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三忠于革命”的“驯服工具”论的斗争；是复辟封建主义同反复辟的斗争。这就是当前我国两条道路，两个阶级大搏斗的实质内容。但是，这场斗争，正确的东西被压制，而完全错误的东西，却又占了上峰。因而，也就形成了极为曲折，极为复杂的局面。

在这场极为复杂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阶级立

场。到底是应该支持八届中央的正确多数，还是支持“派”性中央的错误少数？到底是应该支持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的党性原则，还是支持资产阶级的“个人高于一切”的谬论？到底是应该支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还是支持资产阶级的个人独裁制？到底是应该支持“三忠于革命”的“驯服工具”论，还是支持封建主义的“三忠于个人”的奴化政策？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人们作出丝毫不苟的明确的答案，为克服我党当前所遇到的空前未有的严重困难，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我们希望一切坚持原理、坚持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同志，在保党反“派”的伟大旗帜之下，联合起来。

#### (九)

此外，我们必须再次提起同志们的注意。对一时受蒙蔽而误入歧途的青年，是我们的革命后代，是我们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只能采取百般爱护的方针，热情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使他们迅速地回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而绝对不能对他们采取打击报复和镇压的错误措施。绝对不能采取“党同伐异，排除异己”的错误手段对待他们。在分配工作、升学就业、征兵入伍等等方面，应该一视同仁地，切实保障他们的政治地位和一切合法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国人民在党的八届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重新团结起来。

在全国完全实现了全面和平以后，建议中央在适当的时机，对牺牲在两派战争的战场上的解放军指战员、两派群众和干部、青年学生，全面进行抚恤，安慰他们的家属，以便牢固地实现全国人民的真正大团结，更有效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同志们，团结起来吧！伟大的保党反“派”的斗争，是正义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而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重新大团结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通过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             |          |

---